



美国研究丛书  
孙哲 主编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THE U.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制度变迁与

美国国际经济政策

李 巍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国研究丛书 孙哲 主编

# 制度变迁与 美国国际经济政策

李 巍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李巍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美国研究丛书/孙哲主编)  
ISBN 978 - 7 - 208 - 09199 - 3

I. ①制... II. ①李... III. ①政治制度—影响—对外  
经济政策—研究—美国 IV. ①F171.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3206 号

责任编辑 赵荔红  
封面装帧 王小阳

· 美国研究丛书 ·

孙 哲 主 编

**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

李 巍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n)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0.25 插页 4 字数 454,000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9199 - 3/D · 1708

定价 38.00 元

# 编者的话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五百年未有之大变革，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和全球思想交流交融交锋的大浪淘沙下，中国、美国和整个世界都在经历着跌宕起伏的历史性变革。其中，作为身处太平洋两岸而对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两个大国，中美关系的发展走向则尤其引发世人的诸多猜想和想象。

记得亨利·鲁斯曾说过，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他的论断。在经过一个世纪的励精图治而在19世纪末一跃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之后，美国开始果断告别孤立主义，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一个十分耀眼的角色，凭借武装到牙齿的超强国力，致力于包打天下和改造世界的所谓“天定命运”。在两次世界大战及随之而来的冷战斗中，特别是在应对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及在二战后大规模的国际制度建设中，美国始终以其强有力的物质实力和价值理念在塑造国际秩序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引导着资本主义的另一个黄金发展周期，而且在世纪之交新一轮的信息科技革命及一系列领域的国际竞争中，保持着无可置疑的全球强国地位。此种超强的国力令美国不免洋洋自得，其独步寰宇、睥睨于世的傲慢，不断发酵为“孤独霸主”的幻觉和近乎麻醉的飘飘然。

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正在为自己目中无人的狂傲支付代价。美国的发展频频遭挫，“9·11事件”严重打击了美利坚民族的自信；伊拉克战争使美国的软实力大幅度下降；源于美国而迅速扩展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更使美国的硬实力受到重创。多年积累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在美国国内各个领域的爆发，原本如日中天的美国模式终于黯然蒙尘，美国在几乎所有领域的“领导力”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危机。诚如当年布热津斯基所言，“美国成不了全球警察，也当不成全球银行家，甚至连全球道德家也做不成。因为第一类需要名正言顺的合法性；第二类的根基是拥有偿债能力；而第三类则需自身清白。除非美国能够放弃自己意识形态深处的那种不平等的天定命运观、好为人师观和美国例外观，真正通过加深国际之间的交流，用历史的事实法则在思想意识深处“祛魅”，用充满平等的眼光了解其他民族的真实面貌和思想信念体系，用事实的公正反对思想意识中的狭隘，否则，美国将免不了约瑟夫·奈所警告的那样，美国无法摆脱“强权的悖论”。

与此同时，更加令美国深感不安的是，新兴大国群的崛起和国际实力格局的变迁开始进一步加快，从“金砖四国”到“景象五国”，到处是一派发展一日千里的忙碌气象，与欧美国家夕阳西下、悠闲自得的奢靡之风形成鲜明对比，国际舆论中日益崛起要求对国际秩序进行更大范围改革的呼声，联合国系统的改革一浪高过一浪，20国集团逐渐取代8国集团成为“经济联合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区域一体化浪潮也正在试图撕裂美国人经营多年的全球战略版图。当然，导致国家格局重大演变的还有一些国家实力较之美国、欧、日和新兴大国相差甚远的穷国、弱国的不尽一致的国际行为和内政外交举措。个人、非政府组织力量的兴起，亦让国际社会的

主要角色和主要问题发生了重大变化。面对这一切,作为老牌霸权国的美国不可能无动于衷。

“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一切,决定了美国对当今世界形势的变化极为敏感。面对来自新兴大国的赶超步伐,美国民众内心深处的危机感和焦虑情绪重新被激发出来,“美国永远做第一”的口号激荡起美国30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社会变革洪流。在奥巴马的领导下,一场类似一个世纪以前的新“进步主义”运动正在美国社会重新涌动,一场“新的政治变革长征”已经起航。从奥巴马“美国永远做第一”的口号中,我们不难理解其内心对于战略变革的焦躁;从2009年大刀阔斧的经济刺激计划到倍受争议的金融新政改革,从围绕气候变化而铺开的新能源革命路线图到创造历史地通过了新的医疗改革法案,一直到最近白宫积极推动的教育改革方案,再到顽强地向前推进的美国社会改革,美国正在通过全面的变革企图重塑其全球范围的霸权地位。

有鉴于此,作为一个矢志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国家,中国也必须高扬起变革的风帆。形势逼人急,不管我们愿不愿意,美国仍将是我们必须与之全面交手的最主要国家。为了更好地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中国必须敢于也要善于与美国展开一场环环相扣的“奥林匹克竞赛”,也必须敢于也要善于从对手身上学习。这或许是我们不遑寝息、孜孜以求希望研究这个国家的最现实的首要原因。

自1972年中美重新恢复接触以来,近40年的中美关系一直在合作与冲突的交织出现中曲折前行。对中国来说,“敢斗愿和”、同时尽最大努力来维护中美关系的和平发展一直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宗旨之一。随着中国更加深入地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美两国呈现一种前所未有的相互依赖的景况。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对双边贸易伙伴,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量居世界首位,中美两国的人员往来也异常频繁。同时,两国在涉及中国核心国家利益如涉藏、涉台等问题上仍然纷争不断、羁绊犹存。我们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对美国进行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鸦片战争迫使中国“睁眼看世界”之后,在向西方特别改革开放以来向美国学习的过程中,中国的学术界诞生了一批研究美国的佳作,涌现了一批重量级的学者。但时代在进步,美国也在各种危机与调适中不断自我革新,对美国的研究也迫切需要与时俱进。可惜可叹的是,如果与中国的美国研究相比,毋庸讳言,中国的美国研究水平无论是理论阐释、资料占有,还是研究规模的广度与深度,都令人汗颜。

“美国研究丛书”第二辑依然致力于推动中国学者对美国的研究。中国的美国研究队伍十分庞大,人员众多、领域广泛,举凡政治学、历史学、哲学、文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传播学等几乎每一个学科都在关注和研究美国。但这些学科对美国的研究基本上是孤军作战,一盘散沙,缺乏学科间的交流,难以形成学术资源共享、研究方法互补和学术批评热烈的局面,很多学术交流也停留在本领域内的“孤芳自赏”。“美国研究丛书”第二辑希望打通学科的界限,为所有的美国研究者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具体而言,我们希望在如下四个方面推动中国的美国研究。

第一,美国政治制度的研究。宪政政治下的美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在于,政府强大充满效率的同时又受到应有的约束。公民与政府之间,建立一种稳定契约,人民做出承诺,在被授予限

制政府权力的同时,必须接受和服从政府的管理。这一政体经过了两百年的风吹雨打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人类政治发展历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美国政治研究,就是要考察为什么这一政体在复杂多样的美国社会中能够安身立命,以及这一政体的内在逻辑和发展变化的规律。具体而言,美国政治制度研究主要包括联邦制度研究、总统制度研究、国会制度研究、法律制度研究、政党制度研究、新闻制度研究等等内容。

第二,美国对外政策的研究。资中筠先生在观察 20 世纪的美国时,发现了美国身上的一个奇怪现象:对内行民主,对外行霸道。一方面,人们看到美国在国内奉行自由和民主的原则,另一方面,美国对在国外却存在着一个根深蒂固的权力政治倾向,实行霸道外交。两者看上去似乎相互矛盾,实际上是内在逻辑的统一。美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文明体,如何与其他国家和政治文明体打交道,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美国希望按照自己的逻辑改变世界,美国也希望能够用自己的逻辑改变整个世界。这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研究美国与世界关系的一条政治学线索。具体而言,美国的对外政策研究包括美国大战略研究、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研究、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美国公共外交研究、美国输出意识形态等等内容。

第三,美国社会治理的研究。在两百多年的历史里,除了南北战争之外,美国几乎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社会动乱,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的社会治理能力。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美国政府承担着不同的社会治理职能,把握美国治理社会问题过程中的运行规律,尤其是在当今信息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考察美国政治治理社会的未来走向,也是美国研究的重要任务。具体而言,美国新型社会治理包括围绕移民、堕胎、环境保护、枪支控制等诸多问题上形成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两大势力的激烈冲突。在立法和决策事务中,社会问题越来越占据突出地位,如何治理这些新社会议题和化解新社会矛盾,将成为美国政治治理发展的方向。

第四,美国思想文化的研究。美国远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政治、经济或地理上的物质实体而存在,美国也是一种精神状态,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它不仅仅具有地理的界限,同时也具有思想和文化上的界限。美国作为一个文化实体的独特性,体现在其对自由和平等的精神追求上。如何理解美国的文化内核和精神本质,也是美国研究的重要内容。具体而言,对美国思想文化的研究包括对其自由传统的研究、平等思想的研究、自治和结社传统的研究、宗教信仰的研究等等。

2007 年开始出版的“美国研究丛书”第一辑包括已经面世的《美国学:中国对美国政治外交研究,1979—2006》、《孙中山与美国》、《国会政治与美国对华经贸决策》、《美国思想库与一个中国政策》、《控制沟通:美国政府的媒体宣传》、《营销总统:选战中的政治营销》6 部作品。作为“美国研究丛书”第二辑,收录了以下 5 部著作:

一为孙哲教授的《左右未来:美国国会的制度创新与决策行为》(修订版)。该书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经过大规模修改,时隔十年之后再度出版。再版后的《左右未来》突破了老制度主义静态描述的框架,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出发,侧重剖析美国国会制度变迁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生态,致力于研究“不变城堡”背后流动的制度元素,尤其是在国会文化、规则、习俗、传统、运行机制等所谓非正式制度领域进行了条分缕析的阐释,是对美国国会进行深层开发的一部作品。

二为刘永涛研究员的《美国国会与总统的关系》。该书叙述了美国国会和总统之间关系的宪法基础；考察了当代美国国会和总统作为两个权力机构的各自基本特征，既指出美国国会两院制的内部制约，也揭示了当代美国总统的外交“特权”，以及法院部门在国会和总统关系中所充当的裁决作用。该书还选择了冷战后美国对外及安全政策领域里的若干案例，从经验上分析和说明了当代美国国会和总统在这一领域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及政治互动。

三为赵可金副教授的《美国学：政治维度与中国意义》。该书分别从学科总论、研究分论和政治专题三个维度，对美国学界关于美国政治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涵盖了美国政治的各个研究领域，如国会研究、总统研究、最高法院研究、政党研究、利益集团研究、媒体政治研究、宗教政治研究、政治行为研究等，是一本全面了解美国政治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同时，该书还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上，大胆地提出了推进美国政治二级学科建设的若干想法，特别是作者强调中国的美国研究要强化问题意识、淡化学科意识、推进中层理论研究以及大胆吸收美国学界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心理研究、传记史研究、新制度主义研究、文化人类学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并在若干专题研究领域做了初步的探索。

四为刘建华副教授的《美国跨国公司与民主促进》。该书分析了冷战后美国跨国公司在对外“输出民主”中的作用，在该书中，作者构建了一个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三角模型，旨在从多力量互动的结构中全面、真实地考察跨国公司与“民主促进”的关系。作者认为，美国跨国公司正是在奉行战略理性的国家（政府）、崇尚利润理性的市场（公司）和尊奉价值理性的社会（NGOs）三方双层（母国与东道国）互动中发挥“民主促进”作用的。该书选题新颖且具有现实意义。如近来发生的谷歌事件彰显了该书的选题价值。此外，作者所采用的国家、市场、社会三元关系视角也比较独特，超越了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学国家与市场关系的二元分析视角；书中案例丰富，便于读者感性地把握美国跨国公司在美“民主促进”中所起的作用。

五为李巍博士的《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该书从20世纪70年代全面兴起的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出发，对美国对外经济关系史上的几次关键性的政策调整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关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制度理论模型，它不仅可以用于解释历史、分析现实，也可以用来预测未来。作为一部典型的问题导向的研究型作品，作者尝试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聚焦于美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贸易和金融两大政策议题，对其国内制度逻辑进行了详细阐述，论证了美国国内制度结构及其变迁如何整合了体系、国家和社会三个层次的影响因素，进而塑造了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本书是作者整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一次重要学术尝试。

“美国研究丛书”第一辑的编辑工作大多是我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工作时完成的；这套“美国研究丛书”第二辑的所有工作则是我在清华大学主持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工作之后抽暇进行的。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在清华大学各级领导的关心和爱护下，围绕中美关系开展了一些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在此，我代表中心对社会各界所给予我们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尤其要感谢清华大学中美研究基金理事长于品海先生，正是于先生的古道热肠有力地支持了国家对美外交的发展；我还要特别感谢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教授及国际所的全体同仁在过去两年里所给予的热情鼓励、无私帮助和积极参与。

先贤梁启超变法失败后由日赴美，途中在波涛浩淼的太平洋见大雨倾盆，即赋诗抒情。《太平洋遇雨》云：“一雨纵横亘二洲，浪淘天地入东流。劫余人物淘难尽，又挟风雷作远游。”此诗气势磅礴、意境阔大。如今的中国，已非梁启超当时所可比拟，中华民族遵循“和平发展”之原则，在改革开放后积累的强大国力为世人瞩目。然而，国力的强弱不能一时定论，为促进中美交往的努力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横亘二洲”的暴风骤雨仍时时来袭，在两国人民之间制造了极大的交往障碍。对于危机乃至美国，每个人的想法不完全相同，我们尊重所有爱国者的意见，但是作为学术人，我们希望能与国人、学界同仁一起，以编著“美国研究丛书”这样的实际行动“挟风雷”而“浪淘天地”，壮美事业，为中美关系的和平发展而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孙 哲

2010年5月1日

于北京清华园



# 自序

就在本书完成最后一稿修订的2009年10月末,来自各方的数据显示,遭受美国金融危机打击的世界经济初现回暖的曙光。全球经济提前走向复苏,金融风暴的惊涛骇浪似乎逐渐远去。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奥巴马政府强有力的国际领导,及其富有远见的战略视野。本书正是要论证,在国内层次,强有力的政治领导特别是行政领导,对于美国奉行建设性的国际经济政策、展开务实性的国际合作究竟有多么重要。如果美国人民没有在2009年赋予奥巴马政府足够的领导权威,世界经济是否会像现在这样释放令人鼓舞的积极信号,还不得而知。

本书虽然是我的博士论文,但却是我整个6年研究生学术生涯的结晶。它最初构思于我在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而我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里将这种构思付诸现实。它是我迄今为止,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却是最重要的一次学术的写作,这个过程是新奇的、愉悦的,也是繁琐的、痛苦的。犹如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它映照着我过去六年所有的收获与不足。

本书体现了我试图将国内制度带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学术努力。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政治学(主要是国际关系学和比较政治学)和社会学都产生并发展了洋洋大观的制度学派。我原本感兴趣的是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理论,但是在这片学术沃土之上已经耕耘着数位杰出的年轻学者。作为一名学术后辈,自揣难以实现超越。更重要的是,随着学习研究的深入,我发现,很多重要的国际行为和国际后果,事实上都是国内政治驱动的,单纯在体系层面进行国际关系的理论演绎已经显得“孱弱”。于是,我致力于把已经“丢失的”比较政治学“重新找回来”。硕士毕业之后,我逐渐将研究重点转向国内层面,重点关注国内政治制度如何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并最终将我的研究定位于“国际关系中的国内制度理论”。

我关于国家对外经济政策最基本的学术素养来源于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在硕士期间时,我就拜读了由他主编的《在权力与富足之间: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其中收录有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等人的著名文章。正是该书将我引入了视野宏大的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和历史制度主义范式,并使我开始关注国内制度结构如何塑造了国家的对外经济决策。我有心在卡赞斯坦和克拉斯纳的基础上将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在我看来,他们只是提供了关于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非常粗略的解释轮廓。此后,我又深受米尔纳(Helen Milner)的影响,致力于建立一种打通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的综合性解释模型。

2006年,随着我攻读博士学位的开始,国际关系理论在我学术生命中的地位逐渐降低,美

国政治日渐上升。在继续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保持关注的同时,我开始全力在美国政治领域拓展。

在博士阶段的研究中,我发现了一个令我无比兴奋的事实,当今美国学界许多重量级国际政治经济学者都是研究美国国际经济政策起家,如克拉斯纳、吉尔平、米尔纳、莱克、高娃、戈尔茨坦、奥德尔、帕斯特、西蒙斯、B. 科恩、S. D. 科恩(Stephen Krasner, Robert Gilpin, Helen Milner, David Lake, Joanne Gowa, Judith Goldstein, John Odell, Robert Pastor, Beth Simmons, Benjamin Cohen, Stephen D. Cohen)等等。他们目前仍执教于美国各个主要大学,是美国乃至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方向的引领者。

尽管本书致力于分析和解释,但仍然不可避免地有大量描述性内容,它可能降低了本书致力于追求的理论化程度。但我相信,出色的描述是深刻理解和完整解释的前提,尤其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对美国国际经济政策内容与过程的描述是非常必要的。这些描述性内容是实证研究和理论抽象的基石。同时,与那些因研究范围狭窄而可以精雕细作的论文相比,本书无论在时间跨度还是研究对象上都可谓“大论文”。因为“大”,本书无疑有太多的不完美,但这种“大”却给了思想以更多驰骋的空间。为了享受这种“大论文”带来的思想的自由,我愿意宽容文中在细节描述上可能存在的粗糙之处。

本书涵盖了贸易和金融两大政策议题,但就在接近完稿的时候,笔者发现,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贸易政策在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中的地位已经逐渐下降,相反金融政策特别是国际货币政策的地位正在迅速上升。如果说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美国主要运用贸易政策的杠杆来保卫国家经济利益,那么在此之后,金融和货币杠杆的运用则更加频繁。这也许预示着笔者下一个研究方向。

非常幸运的是,在我的学术道路上,无论是在国际关系领域还是美国政治领域,我都遇到了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并得到了他们的指点。

作为我的博士生导师,孙哲教授帮助我实现了从国际关系向美国研究的转向。进入美国研究决非要远离国际关系,相反是为了更加从容地理解国际关系。我和孙老师最初关于“国会政治与美国对华经贸政策”课题的合作研究,为本书奠定了基础。那是一次以资料收集见长的研究,它为本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原材料”。而且,我非常享受孙老师对我施行的一种“宏观指导、微观放任”的培养方式:他一方面十分关心我的学术进步,另一方面又鼓励我沿着自己的学术感觉前进,对我的具体研究不做干涉,甚至“纵容”我的无知无畏和率性而为。此外,孙老师还持续地以各种方式给我提供经济资助,让我没有生活压力之虞,潜心于清静的学术生活。在我艰难而曲折的学术道路上,也正是孙老师告诉并激励我,真正的才华如火焰般难以压制,总有一天它会成燎原之势,重要的是要为此做好准备。

我的硕士生导师王勇教授最早将我引进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大门,培养了我最初的研究兴趣,并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我无私的帮助。在我硕士毕业之后,王老师仍依然一如既往地关注我的学术发展。如果不是王老师最初给我的学术训练,我恐怕早已经成为一名新闻从业人员,而不是现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专业研究者。

我自然也十分受惠于我现在的合作导师阎学通教授。阎老师一直要求我志存高远,不为

眼前的繁华与诱惑所扰，潜心治学，力成大器。他对我的严厉与慈爱，鞭策与鼓励，期许与包容，令我从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学界科学实证研究方法的践行者和倡导者，阎老师对我个人研究风格的形成可谓影响颇深。

感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及美国研究中心。在复旦求学的三年，我十分享受于这里的自由而踏实的学术氛围，也十分受益于这里的“海派”学术风格。复旦有很多老师都曾给我教诲和帮助，恩情难忘。

感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作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和教学的头号重镇，我在那里接受了关于国际关系学最早的三年启蒙和基础教育，倘若没有这段经历，完成这样一篇博士论文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北大国际学院的诸位老师，不仅是我硕士阶段最主要的授课老师，而且是我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道路上摸索前行的重要启发者和关键引路人。

此外，我要深深地感谢过去多年来一直相互交流相互砥砺的众多学友们，他们的才华与远见，让我深受感染；也正是他们的执著与坚持让我倍感“吾道不孤”的欣慰！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赵荔红女士，我们的二度合作依旧充满愉悦。

而对于我的父母，则是“感谢”二字所远远不能表达的。这么多年来，他们含辛茹苦，为我的求学生涯提供了最坚实的物质支持和最安全的精神港湾。

作为一名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在过去的数年时间里，我常在科学与人文、理论与历史的冲突中痛苦地挣扎。本书对于我的整个学术旅程而言，仅仅只是开始，而不是结束。无论今后岁月如何流转，对学术精神与科学态度的敬畏与谦卑，将始终如一。

完成本书，对人生，对学术产生了新的感悟。面对诸多不期而遇的挑战，我们除了需要勤奋、勇气和智慧，更需要在逆境中不屈不挠、昂扬向上的毅力和决心。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那些最后的成功者往往是最持久的坚守者。于此，特撰词一首，以为后记：

### 渔家傲·大学十年回首

瑜家山顶松柏长  
博雁塔下清波漾  
旦复旦兮十年窗  
泪眼望  
水清木华雁飞翔

昔年不悔少时狂  
今朝犹嫌不自量  
百舸争流君莫让  
江渚上  
乱石堆处梅花香

李 巍

2009年10月25日

于清华园

# 目 录

自序 .....	1
<b>第一章 导论:全球范式与制度解释 .....</b>	<b>1</b>
一、国内制度缘何重要? .....	2
二、社会科学的“分化”与“整合” .....	4
三、定义国际经济政策 .....	7
四、多难困境中的战略目标 .....	11
五、建立一种制度解释模型 .....	14
六、行文安排和基本设计 .....	20
<b>第二章 研究路径和理论模式 .....</b>	<b>24</b>
<b>第一节 体系中心论 .....</b>	<b>25</b>
一、权力结构模式 .....	26
二、相互依赖模式 .....	30
三、国际制度模式 .....	33
<b>第二节 社会中心论 .....</b>	<b>36</b>
一、利益集团模式 .....	37
二、政党政治模式 .....	40
三、社会观念模式 .....	43
<b>第三节 国家中心论 .....</b>	<b>47</b>
一、国家主义模式 .....	48
二、官僚政治模式 .....	51
三、府会过程模式 .....	53
小结 .....	55

<b>第三章 制度理论的生成</b> .....	57
<b>第一节 回归国内制度结构</b> .....	58
一、制度主义研究路径:三个命题 .....	59
二、制度对于政策结果的重要意义 .....	66
<b>第二节 制度的历史与理性选择</b> .....	71
一、宏观制度结构:历史的选择 .....	71
二、中观政府体系:理性的选择 .....	77
<b>第三节 制度变迁下的决策逻辑</b> .....	82
一、府会关系与决策权力的分配 .....	82
二、府会关系与决策信息的传递 .....	86
三、府会关系与决策偏好的形成 .....	89
<b>小结</b> .....	95
<b>第四章 决策系统与微观制度理论</b> .....	97
<b>第一节 行政机构的偏好竞争</b> .....	98
一、贸易代表办公室:执行贸易谈判 .....	99
二、经济顾问委员会:谋划宏观政策 .....	100
三、国务院:总管外交事务 .....	101
四、财政部:管理国内宏观经济 .....	103
五、商务部:维护国内商业秩序 .....	105
<b>第二节 独立机构的非党勿私</b> .....	107
一、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决贸易纠纷 .....	108
二、联邦储备委员会:决定货币供给 .....	109
三、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证券市场 .....	112
<b>第三节 立法系统的扭曲失真</b> .....	113
一、国会决策的权力方式 .....	113
二、国会决策的组织结构 .....	116
三、议员决策的行为逻辑 .....	121
<b>小结</b> .....	123

<b>第五章 走出保护主义(1913—1934)</b> .....	124
<b>第一节 自由贸易的初次胜利及其夭折</b> .....	125
一、美国世界经济霸权的确立 .....	126
二、进步主义运动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 .....	130
三、威尔逊的“强政府”与国际经济政策的转折 .....	133
<b>第二节 保护主义的迅速回潮及其顶峰</b> .....	141
一、保守主义的胜利和制度结构的回归 .....	142
二、一战后美国国内社会联盟格局 .....	145
三、两大联盟斗争及其政策结果 .....	148
<b>第三节 自由主义的最终胜利及其发展</b> .....	156
一、罗斯福“新政”与“帝王式总统”兴起 .....	156
二、“1934年体制”的建立 .....	159
三、走向贸易自由主义和金融国际主义 .....	166
<b>小结</b> .....	171
<b>第六章 走向互惠主义(1971—1988)</b> .....	173
<b>第一节 金融民族主义的初现</b> .....	174
一、美国经济霸权衰落与“特里芬困境”的加剧 .....	175
二、美国国际货币决策的制度结构 .....	182
三、美国政策调整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	188
<b>第二节 贸易保护主义的涌动</b> .....	193
一、美国制度结构的变迁：“帝王式总统”的衰落 .....	194
二、经济相互依赖与国内社会利益的竞争 .....	198
三、《1974年贸易法》：制度调整、政策内容和政策结果 .....	202
<b>第三节 经济互惠主义的确立</b> .....	212
一、国内社会的分裂与两党政策立场的互换 .....	213
二、进攻性的国际货币政策：从“广场协定”到“卢浮宫协定” .....	215
三、“1988年体制”与“公平贸易”政策的实践 .....	224
<b>小结</b> .....	229

<b>第七章 应对全球化(1993—2008)</b> .....	231
<b>第一节 “新民主党人”积极的国际经济政策</b> .....	232
一、经济全球化下的美国制度压力 .....	233
二、多轨并行的国际贸易政策:从积极有为到乏善可陈 .....	242
三、强势财政部主导的国际金融政策 .....	249
<b>第二节 “保守共和党人”的政策与外交</b> .....	257
一、国内社会分裂与党派政治的复兴 .....	258
二、国际贸易政策的总体挫折与局部成功 .....	263
三、“弱势美元”政策与强势金融外交 .....	272
<b>小结</b> .....	282
<b>第八章 结语:制度结构与政策选择</b> .....	284
一、论点总结 .....	285
二、学理贡献 .....	287
三、研究不足 .....	289
四、未来预测 .....	291
<b>参考文献</b> .....	293

## 第一章

# 导论：全球范式与制度解释

学术上的兼收并蓄比独守一帜更有利于对问题的理解和知识的增长。<sup>①</sup>

——盖依·彼得斯

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大学里对“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不合时宜的区分，似乎已经被世界经济的国际化敲响了丧钟。<sup>②</sup>

——海伦·米尔纳、罗伯特·基欧汉

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到赫克歇尔、俄林，再到保罗·萨缪尔森，这三代经济学家用简约严谨的数学模型证明了以国际贸易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能带来参与国总体经济福利的增长。<sup>③</sup>将生产要素跨国自由流动推向极端，就是国家完全抑制通过政策工具干预国际市场的冲动，任凭“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来调节资源和要素在国际市场上的流动。<sup>④</sup>但是贸易保护和金融管制的势力和声音从来没有消失过，并且经常会在国家的国际经济决策过程中获得胜利，促使中央政府采取关税、配额、补贴、技术壁垒以及汇率操纵和资本控制等手段来干预国际市场，即便是经济实力最强大，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利最多的美国也是如此。国家并非总是一贯按照比较优势和效率的逻辑来制定和执行国际经济政策，其背后还有强大的政治逻辑——无论是国际政治的还是国内政治的——在发挥作用。这使得对国家国际经

---

<sup>①</sup> B. Guy Peters,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Wellington House, 1999), p. 2.

<sup>②</sup> 海伦·V. 米尔纳、罗伯特·O. 基欧汉：《国际化与国内政治：结论》，载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主编：《国际化与国内政治》，姜鹏、董素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8页。

<sup>③</sup> 对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最新进展的阐述请参见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海闻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sup>④</sup> 不过，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如詹姆斯·托宾、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巴里·艾肯格林、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保罗·克鲁格曼等，都认为短期资本的过快流动则是一个例外，它很可能对国家的金融体系带来破坏性影响。对短期投机资本流动实施一定程度的管制，有助于提高市场稳定性。坚决支持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巴格瓦蒂也反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过早开放资本市场，参见 Jagdish Bhagwati, "The Capital Myt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rade in Widgets and Dollars," *Foreign Affairs*, Vol. 77, No. 3, May/June 1998, pp. 7-12.



济政策的解释必须由政治学来加以完善。

国际政治学家认为,在国际层面,自由贸易和自由金融确实给整个世界带来了经济福利的增长,但是这种经济福利的分配在不同国家并不均等,其带来的相对收益(relative gains)和绝对收益(absolute gains)问题影响国际竞争格局和国家安全,带来了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国家安全与经济效率的考量和抉择,从而促使国家通过政策工具对国际市场进行干预;<sup>①</sup>比较政治学家则认为,在国内层面,自由贸易和自由金融能增加一国的整体经济福利,但对国内不同经济主体而言,却在制造获利者(winner)的同时也制造了受损者(loser),不同的经济行为主体为争夺有利于自身的经济资源以及贸易和金融所得的分配,而展开激烈的政策竞争,这使得国家政策经常会因为各行为体政治实力和政治联盟的变化而发生调整。

因此,一国以贸易问题为核心的国际经济政策不仅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学的问题;不仅是国际政治的问题,也是一个国内政治的问题。国际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包括了国际制度、跨国机构、外国政府、本国政府各部门、政党和利益集团等多种行为体之间的斗争与博弈,各种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对比和行为能力决定了它们的政策影响力,进而塑造了它们之间的财富分配;反之亦然。这既体现了政治与经济的联系,也体现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互动。<sup>②</sup>所以,要想理解国家的国际经济政策,需要的是一种跨越政治和经济、国际和国内的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GPE)的新范式。<sup>③</sup>

本书研究美国联邦政府如何通过政策工具,主要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这两个领域的政策工具,来调整和塑造美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本书集中考察美国国际经济政策制定的政治动因,经济逻辑并非本书的重点,对于后者,将留给经济学家。<sup>④</sup>

## 一、国内制度缘何重要?

政治学家(国际政治学家和比较政治学家)在研究美国国际经济政策时,提出了三种主要

---

① 对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的现实主义分析可参见 Joseph M. Grieco,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Europe, America, and Non-Tariff Barriers to Trad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26.

② Helen V. Milner, *Resisting Protectionism: Global Industrie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3.

③ 国际政治经济学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逐渐由宏观范式辩论转向更加专门的议题研究,密切关注经验事实,其中国际与国内的跨层次研究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对此,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使用“全球政治经济学”作为书名,代表性的参见 Theodore H. Coh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and Practice* (Addison Wesley Longman, Inc., 2002); Robert Gilp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Ronen Pala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ontemporary Theo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相关论述参见李巍:《国际政治经济学演进的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 年第 10 期,第 72 页。

④ 中国学者王勇倡导一种分析国际贸易问题的国家—市场—社会的三维框架,参见王勇:《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8 年版,第 11—15 页;王勇:《中美经贸关系》,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 年版,第 5—14 页。在本书中,笔者主要从国家—社会关系来分析美国国际经济政策,市场这一维度虽然不能说被完全“省略”,但至少不是本书的核心研究变量,这是因为经济学界从纯市场维度分析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著作几乎多如牛毛,而笔者则试图重新复兴国家—社会的维度。